

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的崛起

——鲁迅杂文研究之一

白 焱 岐

(一)

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样式,鲁迅杂文究竟是如何萌芽,如何发展的,研究者们较少涉足这一领域,因而尚有进行综合探讨的必要。

鲁迅曾概略地说过,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①。《新青年》杂志,可以说是现代杂文的摇篮。杂文的最初的开拓者,除鲁迅外,尚有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吴虞、周作人、胡适等。当文学革命发轫时,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尚属纯议论文,而且留有文言的外壳,但文中所透露的对封建文化的激烈攻战,却是与后来杂文的精神相符的。一九一八年,《新青年》断然改用白话行文,同年四月更增设了专载短评的《随感录》专栏,这就不但使杂文获得了与其战斗内容相宜的语言形式,而且也使长篇论文具备了向文艺性短论发展的趋向。就在这年七月,鲁迅撰写了《我之节烈观》;九月,参与了《随感录》的写作。鲁迅与其他作家一道,为杂文的发展建立了开创性的历史功绩。

对杂文产生的原因,第一个作出了科学解释的,是瞿秋白。他于一九三三年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融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方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②。这个论断当然是经典性的。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重新衡量,应该也可以对它加以补充和完善,以便作出的说明更准确、更科学。

瞿秋白把杂文的产生归因于一定社会为文学发展提供的客观条件,是正确的。但是,处在“五四”前后那样一个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觉醒的历史时期,作家主观的革命要求和由此而来的对文学样式的自觉抉择,也决不应该忽视。恩格斯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③。这句话大抵可以借来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们。他们高举民主、科学、新文学的大旗,蔑视一切传统的权威,无情地批判一切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鲁迅也是前驱者之一员,但他更善于对中国的社会和革命进行冷静而深刻的观察,并不断剖析各种社会力量,其立足点则是寻找中国人民的出路。他从来都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厌恶超功利的文学观,并多次说过“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④一类的话。可见,鲁迅是将改造人民的精神放在首要位置,文学是他当时认为通向这一目标的最好道路,而杂文则是他为完成这一任务自觉选择的武器。

文学史上的事实也是如此。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胡适和陈独秀有首先发难的历史功绩。但是,胡适的主张主要停留在文学形式的改革上,陈独秀虽是推倒封建文学的先锋,却又强调文学有着不能“附以别项条件”的“独立存在之价值”^⑤。他们的文学观是片面的、矛盾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前进方向,而鲁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也对它“并没有怎样的热情”^⑥。在鲁迅看来,单

是文学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思想革命。当然，“思想革命”的口号，是周作人最早明确提出的。但在此之前，鲁迅在《渡河与引路》一文中，已论及“思想改良”的命题，而且当时正是周氏兄弟亲密合作的时期，所以这个口号的提出，无疑有鲁迅的思想影响在内。鲁迅的杂文创作与小说创作一样，是要借文学之力以促进人民思想的觉醒；可以说，其作品是以思想革命的实践，弥补了早期文学革命的理论缺陷。

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结合，使得对于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批判更显必要。在当时的先驱者们看来，“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但却遇到了“保守家们的压迫和陷害”⑦。这样，就在清除旧物和反抗迫害两个方面，产生了对杂文的迫切需要。于是，“五四”前后的文章，内容遂偏于批判议论，文字必趋向锋利简洁，文体也活泼多样，不拘格套，而且，为了更能移人情，又加强了形象化的表现。鲁迅等先驱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和开拓了杂文这一文学样式，实在是因为文学革命乃至思想革命所赋予的任务，只有它才能更广泛、更直接、更深刻、更及时地完成。他们还最早从理论上肯定了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刘半农甚至说：“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⑧。就是说，不仅由于社会时代迫切需要，而且由于先驱作家“非常革命”，杂文才应运而生。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们个人的学养和才华，足以副他们开拓一种新文学样式的雄心。第一代杂文大家，差不多都兼有思想家、革命家、启蒙学者的多重品格，是“五四”时代的巨人和骄子。他们从小就养殖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大多在欧美日本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又都云集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时代锻炼了他们的才干，他们又以自己多方面的贡献影响、推动着时代的发展。陈独秀既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者和领导者，又是北大的文科学长，文章常具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胡适以二十六岁的英年出任北大教授，既是学者，又常涉足创作领域，写出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并最早发表了话剧剧本。钱玄同、刘半农在文字学、语言学上有不同的建树，而在早期杂文园地中，则以凶猛的健将知名。鲁迅在多年的沉默、观察、思索、积累之后，一开手就成为第一篇白话小说和第一部小说史专著的作者，也是最早的新诗人中的一个。他们卓越的学养和才华，给杂文带来了思想上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内容上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以及艺术表现上的丰富多彩。而这也正是杂文能在短时间内赢得读者、扩大阵地、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

此外，对瞿秋白的著名论断，如果理解为社会条件不容许作家去从容构思长篇巨制，作家不得不去创作篇幅短、费时少的杂文，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说社会条件竟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而只能凭借“幽默才能”或其他“艺术的形式”来撰写社会论文，那恐怕就失之偏颇了。这种说法对鲁迅杂文最重要的艺术特征重视不够，也对杂文中塑造的大量形象缺乏总结。

鲁迅杂文在艺术表现上的形象性特征，正是它有别于一般政治性论文之处。一般政治论文当然也可以有形象性，例如使用形象化的语言，借用生动鲜明的形象来比喻；但这都是为议论服务的，目的在于加强说理的效果。鲁迅一部分议论性较强的杂文，固然也是这样；但在那些脍炙人口的文艺性短论中，却常常表现为用形象的思维，对形象的解剖，以及以形象本身来进行的论证。鲁迅杂文的形象性已不再处于附庸的地位，更不是一层外在的油彩，而是其贯穿首尾的重要内容，是其议论说理的有机组成。杂文中的形象不但来自现实生活，包容着作者的思想 and 评价，而且饱和了作者浓郁的感情，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鲁迅使形象进入了议论，与议论融为一体，取得了比单纯的议论还要入木三分的效果。

(二)

“五四”时代鲁迅杂文的成功，与鲁迅善于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的精华是分不开的。鲁迅杂文首先是作为封建思想文化的尖锐对立物出现的，但也择取了后者在长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一切有价值的遗产，以为自己成长的营养。

中华民族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中，包孕着一些最富于民主性和人民性的积极成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列宁指出，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

深厚的感情”^⑨。中国漫长的历史，浸透了人民的鲜血和眼泪，特别是每当国家危亡的关头，中国人民及其优秀代表，为保卫家园，维护文化传统，前仆后继，殊死奋斗。历史的特殊性和同一文化的凝聚力，培养了中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封建思想文化中，还有一些多少反映着人民的痛苦、利益和愿望的成分，例如哲学上的辩证法因素和朴素唯物论观念，政治上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等，它们在历史上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正宗儒学的理论代表，都力主用政教化和伦理化的学说，为巩固封建制度作出实际的努力。这些先行的思想材料和主张入世的积极精神，哺育着封建社会中一代又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形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作出了应当肯定的贡献。

鲁迅杂文创作中的思想内容，正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固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卓越体现。由于出身和教养的关系，鲁迅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染。第一本启蒙读物《鉴略》，即已教给他“从古到今的大概”^⑩。他虽然从诗书经传中逐渐看出儒学的保守和虚伪，但也领悟到它“备世之愈”^⑪的长处。他从小爱好民间文艺，杂览笔记野史，并特别留意于那些记载宋明以来异族入侵的“痛史”，以及表彰浙东义士抗暴雪耻事迹的文献。从古代典籍中去感受民族的苦难和先贤的贡献，初步激发了鲁迅的爱国热忱，培养了他对社会的责任感，也帮助他在日后逐渐形成对历史和人民的比较全面的观点。

但是，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本来就只是封建文化总体中的一些积极成分，又与忠君、入仕等观念胶合在一起，只有无数先进分子的挣扎和战斗，才使它们能够抵御社会、时代的黑暗，不绝如缕，代有传人。鲁迅杂文从现实斗争出发，全面批判了封建思想文化及其具体表现。他抨击古书教人“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⑫，杂文笔锋直指复古崇道、尊孔读经，乃至宣扬迷信的种种社会相。他同样严厉地批判自己头脑中封建文化教养的毒素。他说过，自己曾“看过许多旧书”，孔孟的书“读得最早最熟”，尤其是很“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常“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思想，摆脱不开”；因此要“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⑬。正是由于对主、客观世界的无情批判，才使封建文化传统中固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获得必要的改造，脱离了封建体系的桎梏。表现在鲁迅身上的社会责任感，由早期改良社会和国民性的抱负，逐渐升华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坚强意志；而他的爱国主义，也在与各种民族沙文主义、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中，最终发展为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精神。在古代优秀思想传统的影响下，鲁迅使杂文的思想内容具备了一种内在的、深厚的民族气质：伟大、睿智、坚韧、抗争。

作为杂文母体的古典散文，也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先秦时代，儒道法墨各派宗师，无不以散文来宣扬自己的学说政见。后人把这种情况正确地总结为“文以载道”^⑭。但到了封建末世，正统散文一步步堕落，它所载的“道”，也演变成阻碍时代发展的腐朽思想。因此，“五四”新文学的先驱们奋起反对“载道”的古典散文。陈独秀认为，“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⑮，还把“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斥为“十八妖魔”^⑯。周作人也指出，古文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佛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⑰。这些言论对于摧毁封建主义旧文学，建设民主主义新文学，作用很大；然而，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倾向。他们对古典散文中的优秀作品采取漠视、轻视的态度，对古典散文“载道”的传统也不作认真分析，甚至笼统地提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⑱。这就在实际上否认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而给新文学的建设埋下危机。其实，不论作者意识到与否，作品总是要“载道”的。孔孟崇尚礼乐仁义，祖述周公文武；老庄信奉虚静自然，主张无为而治，“道”虽不同，“载道”却彼此一样。问题的实质仅仅在于：“道”本身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是否正确，是否代表着社会的前进方向。

鲁迅在杂文创作中，常常艰苦探索古典散文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作为发展杂文战斗精神的借鉴。唐宋名家如韩愈、苏轼等，“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⑲，颇为鲁迅赞赏。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作品，充满了对社会的愤激之情，被他誉为“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⑳。甚至对明末“性灵”派文人，他也作出公道的评价，指出他们“也有人豫感到危难，后来是身历了危难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愤慨”^㉑。然而，在精神上与鲁迅杂文关系更密切的，确如有的学者所说，乃是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散文和近代章太炎的辩论文章。嵇康的文章，好谈异端，激越悲愤；章太炎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论

辩时，词锋锐利，所向披靡，都曾使鲁迅深为叹服，也培养了他杂文中那种“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②”的作风。鲁迅自觉地赋予杂文以高度的思想性和革命的战斗精神，使杂文成为载革命之“道”、改造社会人生的利器。

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接受的影响，也许更明显地流露在鲁迅杂文的艺术表现上。杂文中的短评，直接受先秦议论文和历代富于战斗性的小品文的启迪；其他文体，在古代也多有可资借鉴的精品。鲁迅早就惊异于《离骚》的“逸响伟辞③”，心折于《庄子》“文辞之美富④”，推许《史记》的“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⑤”，并全面评价了文学史上的不少名家。古典作家及其作品，往往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到鲁迅的艺术修养。而历代的野史笔记、文言和白话小说，更为他从小爱好；读之既熟，信手拈来，常可化为以古论今的材料。其中《世说新语》一书，即以其简括而传神的人物品题，对鲁迅杂文中的只用寥寥数语便勾魂摄魄地刻画一个形象，有很大助益；《儒林外史》也有助于他杂文的讽刺艺术的形成。当然，鲁迅杂文更师承了魏晋文章的优点。孔融的以古讽今，擅用反语；嵇康的层层缕析，文藻华瞻，都曾为鲁迅称赞。而读者也常能从杂文的构思、取材、辩难、用词诸方面，感受到魏晋作家的影响。

可见，在思想传统上和艺术传统上，鲁迅杂文都与古代文化保持着一定的承传关系。对文化遗产，鲁迅提出过著名的“拿来主义”。他所处身的时代和他对自己使命的明确认识，都使他特别喜爱历史上那些热爱祖国和人民、反抗暴虐和黑暗的作家、作品。这些，自然成了他择取的首要对象。而在艺术上的吸收范围，似乎还更要广泛，只要是“究竟有文彩⑥”的，即艺术表现确有可取之处的，他认为就有学习、借鉴的价值，即使是“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他也主张“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⑦。广泛涉猎，博采众长，使鲁迅杂文获得了多元的影响。这与杂文所反映的现代生活相结合，便流露出浓郁的民族风格，从而使杂文逐渐成为民族文苑中一枝绚烂多姿的奇葩。

(三)

在现代杂文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还明显现出外来的各种思潮和文学作品的积极影响。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特点。

众所周知，鲁迅在青年时代就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日本留学期间又留心于尼采的超人哲学和个性主义。尽管这些影响表明他尚无力摆脱唯心史观的束缚，但它们在鲁迅前期杂文中，大量表现为反对复古退婴的呐喊，为人民大众争取生存、温饱和发展而战叫，以及对统治者的自私、腐败的憎恶和对尚未觉醒的群众的愚昧、奴性的愤慨。它们所发挥的反封建的战斗性，远远超过了其固有的局限性。稍后，鲁迅又对厨川白村发生了兴趣，高度评价他对日本社会封建世态的攻击。鲁迅特别用厨川白村的话来强调杂文的职责：“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并确实把批判的锋芒砥砺得比“五四”前后更加锐利了。

应该认为，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前，鲁迅对外国资产阶级思潮的吸收，于杂文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反封建是思想文化战线的头等大事。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还远远不够成熟，资产阶级又过于软弱，实在拿不出象样的思想武器，人们不得不到国外去寻找真理。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思潮，本来就是这些国家反封建斗争的产物，被输入中国是不足为奇的。鲁迅正是被这些外来思潮反封建的精神所吸引，而把它们选作批判的武器。但他对各种思想都不是原封照搬，而是施以严格的检验和改造，使之能为我所用。也可以说，他实际上是从达尔文、尼采、厨川白村等人那里，选用现成的思想材料，来重新锻造反封建的武器，其表现和作用，都已与原来的形态不尽相同了。鲁迅就曾声明过自己和尼采的区别：“尼采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而自己则主张“扶他一下”，并在车翻之后“切切实实的帮他抬”⑧。正是这些经过改造的外来思潮，使鲁迅的前期杂文装备了攻坚的武器；然而，这些武器又实在过于陈旧，使鲁迅前期杂文在勇猛进击之余，也时常流露出孤寂、苦闷、彷徨的情绪。

为了寻找新的思想武器，二十年代中后期，鲁迅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从一九二九年起，三四年间几乎每天手不释卷的在翻看这方面的著作”⑨。马克思主义带来了科学的社会观和文学观，这与他宝贵的革命传统、丰富的斗争经验、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而独到的认识相结合，遂在杂文创作中打开了新的局面。鲁迅的后期杂文，直接投入了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血腥战斗，批判的锋芒几乎无所不到，

显示了战无不胜的威力，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从容、舒展的精神风貌。

杂文在其文体形成的过程中，还曾经受过外来文体feuilleton的刺激和essay的影响。在法文中，feuilleton原是指报纸角落的文学小专栏，用以刊登小说、故事、文学鉴赏、文艺批评之类的简短文字，供人们茶余酒后随意翻阅。还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初期，近代化的新闻思想就开始传入中国，出现了中国人主持的中文报刊。它们适应“开发民智”的需要，很注意登载浅显而简短的文学作品和批评文章。于是，文学专栏就逐渐形成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激发了全国人民精神上的觉醒，文学革命又直接为报刊提供了最为便捷的语言工具，各种白话报刊遂大量涌现。综合杂志开辟了小说、诗歌、杂文等专栏，日报的附张也从登载黄色新闻改为登载文学作品或论著，一些有名的报纸更设立了副刊，如《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这样，feuilleton的范围遂从文学作品、文艺批评扩大为社会批评，而形制也自然成了短论类的“急就章”。

鲁迅很早就与文学专栏发生了联系，一九〇三年，他的《斯巴达之魂》就刊登在《浙江潮》的《小说》栏中。后来他在《新青年·随感录》中发表的杂文，就更可以称为新的feuilleton了。这种形式在鲁迅手中，已完全改变了西方资产阶级沙龙文学的性质，而充满了批判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瞿秋白把鲁迅杂文称为“战斗的feuilleton”。

在分析“五四”时期散文小品成功的原因时，鲁迅曾说过：“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⑨。许多论者遂以此来说明essay对鲁迅杂文的影响。但essay一词在英文中含义甚广，除随笔外，还有小品文、议论文等意思；而且杂文的特点，显然不是“幽默和雍容”、“漂亮和缜密”所能概括。鲁迅这段话，并非针对自己的杂文而言。

有的研究者已经发现，厨川白村对于essay这一文体作了精彩的解释和发挥，其中很大一部分与鲁迅关于杂文的见解相当接近。厨川白村认为，essay的题材可以极为广泛；鲁迅杂文的笔触确已伸向社会人生的几乎一切角落，甚至象照显微镜一样，“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⑩。厨川白村要求作家在essay中表现自己的个性；鲁迅也主张作家“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⑪；他的杂文也鲜明地表现了自己率真的个性和崇高的人格。厨川白村指出，诗歌和散文的结合才是essay，作者须兼具才华和学识；鲁迅杂文最根本的艺术特征，被公认为诗歌和政论的结合。他在杂文中所显示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学识和深刻的洞察力，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还没有可以比肩的第二人。如果说，essay对鲁迅杂文的发展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恐怕并非一枝一节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是鲁迅翻译的，他关于essay的见解又与鲁迅发生广泛的共鸣，或者说，essay对鲁迅杂文发展的总体性影响，就在这里罢。

在艺术表现方面，鲁迅杂文虽然更多地承袭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但也从外国文学中获得了营养。果戈里讽刺的辛辣，阿尔志跋绥夫暴露的彻底，都曾激动过鲁迅。值得注意的是，尼采也曾以相当的文学造诣，影响过鲁迅。鲁迅的一部分杂文中，那种先声夺人的气势和逼真的讽刺性形象，对论敌的高度蔑视和仅以一击致敌死命的作风，以及语言的冷峭和幽默，与尼采的文章不无相通之处。当然，这些相似的艺术表现，是为根本不同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同时，鲁迅也很注意将外来的新技巧与中国的艺术传统相结合，从而使杂文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提高了战斗效果。

“五四”高潮退后，开拓现代杂文的一批先驱者迅速分化，大多背离了杂文的战斗传统；而鲁迅却更勤奋地进行杂文创作。在他的带动下，杂文创作成果日显斑斓，作家队伍也日渐壮大，终于在三十年代形成了被称为“鲁迅风”的一代文风。别林斯基说：“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像，可感触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因此，任何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体”^⑫。这些话指的是大作家所特别擅长的某种文体。而鲁迅贡献于人世的杂文，却是由具备个人的独创性，以文艺性短论为主的多种文体，如评论、论文、书信、日记体散文、语录体散文、叙事文、抒情文、序跋文、小品、随笔所组成的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鲁迅是现代杂文最有代表性的开拓者和发展者，他的名字已与杂文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了。这样的贡献，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注解:

①④⑧⑩⑫⑭⑯⑰⑱⑲⑳㉑㉒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576、512、455、12、575、576、147页。

②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④ 恩格斯:《反杜林论》。

⑤ 陈独秀:《通信·答曾毅》,载1917年《新青年》3卷2号。

⑦⑲㉔ 《鲁迅全集》第6卷,第20、417、344页。

⑧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

⑨ 列宁:《皮梯利姆·索洛金的宝贵自供》。

⑩ 《鲁迅全集》第2卷,第264页。

⑪ 《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

⑫ 《鲁迅全集》第3卷,第129页。

⑬ 《鲁迅全集》第1卷,第284页。

⑭ 宋·周敦颐:《周濂溪集·通书》。

⑮⑯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⑰ 陈独秀:《通信·答胡适之》,载1917年《新青年》3卷3号。

⑱ 周作人:《人的文学》。

㉑ 《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页。

㉒ 《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

㉓ 《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

㉔ 《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

㉕ 《鲁迅全集》第5卷,第296页。

㉖ 《书信·致钱玄同》。

㉗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

㉘ 《鲁迅全集》第8卷,第376页。

㉙ 别林斯基:《一八四三年的俄国文学》。

(上接第56页)

有的学者则认为,如果从哲学路线上看,熊十力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无疑分属两条不同的、对立的哲学路线。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熊十力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但如果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上看,熊十力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熊十力区分哲学与科学,强调发展科学的重要意义;同时又倡“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坚持民主主义。在这层意义上,他的思想又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一致之处。

还有学者认为,五四以后,建国之前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并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非此即彼”的对立两极,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体系,只是到了三四十年代,才有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等贞元之际之作、金岳霖的《论道》、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等等体系。他们的哲学思想产生于近现代中、西、印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氛围之中,反映了希望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社会心理。他们在理论思维上为我们民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难于避免的某些局限,他们把外来文化、外来哲学中国化的可贵尝试,值得有志于建树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人们所借鉴。

尽管与会学者在熊十力哲学的具体评价问题上见仁见智,各有所得,但都认为,熊十力哲学同梁漱溟哲学、冯友兰哲学、贺麟哲学、金岳霖哲学一样,都是中国近代哲学史、思想史与文化史上值得珍视、亟待研究的哲学资料。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和熊十力哲学研究的展开,对于进一步开拓五四以后近现代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进一步肃清这一领域中左的遗毒,具有重要的意义。